

長安學術

第四辑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编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创于1897

長安學術

松林墨

第四辑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编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安学术. 第四辑 /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3
ISBN 978 - 7 - 100 - 09904 - 2

I . ① 长… II . ① 陕… III . ① 长安 (历史地名) —
文化史—文集 IV . ① K294.1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2161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长安学术

(第四辑)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9904 - 2

2013年6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6 1/4

定价：48.00元

《长安学术》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名誉主任：霍松林

编委主任：李西建

编委会副主任：张新科 邢向东 刘生良

编委会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尤西林 王 荣 邢向东 刘生良 刘锋焘
李 强 李西建 李继凯 张新科 周淑萍
胡安顺 赵学勇 赵望秦 党怀兴 高益荣
程世和 霍有明 霍松林 魏景波

名誉主编：霍松林

主编：李西建

副主编：张新科 邢向东 刘生良

本辑执行主编：张新科 刘银昌

目 录

[散文理论研究]

- 谭家健：六十年来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之一瞥 (1)
王长顺：“古典散文学”体系的建立及其意义 (7)
梁祖萍：《文心雕龙·章表》篇探微 (18)
阮忠：韩愈散文的意辞观及其一体化原则 (30)

[先秦散文经典研究]

- 王晓鹃：论墨学衰微的原因
——兼论墨家之思想价值 (39)
张树国：论《左传》的性质及其对古代散文研究理论建构的意义 (49)
刘生良：论《庄子》散文的结构艺术 (64)
刘文斌：五十年来《晏子春秋》研究的成绩与反思 (74)

[史传及笔记散文研究]

- 刘银昌：《史记》数术学管窥 (85)
钟书林：《后汉书》的附传法及其文学特色 (95)
祁伟：从《林间录》看惠洪的禅林人物书写 (103)

郑继猛：“梦华体”补论 (115)

黎 羌：中国古代笔记散文小说中的戏曲史料考论 (124)

[明清散文研究]

史小军、王勇：论刘基赠序文对韩愈散文之接受 (143)

张德建：明代赠序文研究 (151)

何婵娟：张岱小品文中的人物探究 (165)

张志春：与人相称与貌相宜

——李渔、卫泳散文小品中的服饰世界 (173)

莫山洪：桐城派：从反骈到融骈 (190)

[其他]

魏耕原：陶渊明散文的诗化 (201)

王 青：客观知识与文化偏见

——以岭南地志对物产与风俗的不同态度为例 (210)

王作良：《游城南记》版本述考 (220)

柯卓英：论唐代游记散文的主题和区域传播形式 (230)

王培峰：祖述乡贤传薪火，名山事业得其人

——评赵望秦、张新科主编《史记文献研究集刊》五种 (246)

六十年来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之一瞥

谭家健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048)

摘要：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中国古代散文研究虽经历坎坷，但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前三十年，古代散文研究学科处于探索与酝酿阶段，后三十年则为草创与初建期；前三十年研究成果零星稀少，乏善可陈，后三十年研究成果丰富；前三十年尚未出现专业研究队伍，后三十年专业研究队伍初步形成。今后中国古代散文研究要努力实现与现代生活的对接，创新探索，避免低水平重复研究，重新构建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古代散文价值体系。

关键词：古代散文；六十年研究；价值体系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学科的一个分支，和其他古代文体研究共同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六十年，取得了可观的成绩，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一、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学科初步建立

中国古代历来诗文并重，两者长期处于文坛主导地位。“五四”以后，新文学取代旧文学，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小说戏剧上升为文学主流，诗文退居客位。由于文言文在生活中逐渐淡出，学习古代散文的实用价值减小。1949年以前，报纸社论用文言文，1949年以后，社论一律用白话文，从此，报刊不再见到文言文。而在这之前，二三十年代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如赵景琛《中国文学小史》(1928)、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1935)、张希之《中国文学流变史论》(1935)，已经完全不讲散文。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古代散文研究之地位可想而知。

1949年到2009年的六十年，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学科经历了重新建立的过程。前三十年是摸索和酝酿时期，后三十年是草创和初建时期。

确立一门学科，首先要确认所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形成研究的基本理念和方法。这就涉及哪些古代作品算散文，哪些不算，以及散文的概念和艺术特征等原则问题。二三十年

代、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先后有过讨论，至今仍存在歧见。但是，基本观点逐步趋于明晰。大多数学者认为，古代散文研究有别于语言学之重训释、哲学之重义理、史学之重考证，散文研究的对象是具有艺术审美作用的文章，它属于文学，而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

关于古代散文的价值取向，五十至七十年代着重讲政治性、思想性，尤其是人民性、阶级性。而八九十年代以来，着重于其中各种文化内涵，注意人性和个性。关于研究的方法，五十至七十年代简单地以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为主线，只讲一分为二，不讲合二而一。而目前的研究，则充分注意到作家作品的丰富性、复杂性、矛盾性。过去只强调批判，越是精华越要批判。现在则以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研究目的。并且注意吸收新的外来的办法，如比较文学、文化人类学、叙事学等等。前三十年虽然也讲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一家做主。后三十年才有真正的百花齐放。

一门学科是否得到社会的认可，一个标志就是在大学里是否成为一门常设课程或专业方向。在汉代就叫做“立于学宫”。目前各大学里，开设中国散文史已不少，如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等。作为硕士、博士研究生的专业方向的也有好几家。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以中国古代散文为题目的越来越多。这些都是学科影响力逐步扩大的标志。

当然，古代散文这个学科比起相邻学科还很不成熟：学理建树相对滞后，还没有形成古代散文研究本身的价值体系、概念和方法，还不能与现代散文研究真正地贯通，更不能与外国散文研究对话和比较。所以说只能算草创阶段。

二、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成果逐渐积累

前三十年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散文的成果乏善可陈，研究性专书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散文研究论文选集》等少数几本书，此外就是一些散文选本。学术论文虽有一些，但是影响不是很大。

后三十年的成果大大超越前三十年，大致可分为几大类：

关于中国散文史研究。有两部大型著作，一是郭预衡先生的《中国散文史》，三册，一百五十万字；二是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集体编著的《中国散文通史》，上下册，一百五十万字。两者风格不同，郭著个性尤其突出。这样的大部头著作，在小说史、戏剧史、诗歌史研究中也不多见。

据悉，北京师范大学正在集体编写十二卷本的《中国散文史》，从古代讲到当代，总计三百多万字，有望在2009年底完成。

四十万字至六十万字的中型的中国散文史有七部，作者分别是：刘衍、谭家健、张梦新、刘振东等。三十万字以下的有十来部，不一一列举。

断代散文研究，先秦有八部，汉代有六部，魏晋南北朝有七部，唐代有两部，唐宋八大家有十三部，宋代有七部，明清有八部。

分体散文史中，辞赋史有十二部，传记史有八部，寓言史四部，骈文史两部，游记史四部，此外还有杂文史、尺牍史、日记史等。

关于作家作品的研究。数量很多，书目不便一一列举，只举几部重要作品的研究成果为例。对于先秦，以《论语》、《庄子》为重点。仅2007年一年，就出版了一百一十多部关于《论语》的书。其中七十多种为评论类，三十多种为注释类。关于《庄子》的书，2007年一年出版了七十多种，其中评论类五十多种，注释类二十多种。其中多数讲人生修养，真正具有学术创见的不多，专讲文学性的尤其少。对于汉代，以《史记》为重点。三十年来，评论《史记》的著作有六七十部之多，注释类也不少。其中以韩兆琦先生的《史记笺证》成就最高，九册五百五十万字。对于唐宋，以韩、柳、欧、苏为重点。关于韩愈的书有三十多种，柳宗元有二十多种，欧阳修有十八种，苏轼近四十种。对于明清，关于公安派的书有十来种，桐城派有十多种，关于明清小品的研究有十来种。

关于散文理论研究。相对于史的研究，这方面要薄弱些，比较重要的有十来种。具有代表性的是朱世英、方遒、刘国华等合著的《中国散文学通论》，八十万字。以及周明的《中国古代散文艺术》、万陆的《中国散文美学》、吴小林的《中国散文美学史》、张国俊的《中国散文艺术论稿》等。

关于基础资料的编辑整理。有周一良等主编的《全唐文新编》二十二册。曹枣庄、刘琳主编的《全宋文》一百八十册。曾枣庄等编的《宋文纪事》一百一十万字。李修生主编的《全元文》六十册。王水照编的《历代文话》十册，六百万字。

关于普及性选本和古文鉴赏辞典。这方面的著作数量极多，内容丰富多样，但是有不少重复，如有关《古文观止》的注释，五六十年代出版过两种，从1981年到2008年，二十八年间出版了一百八十种，多数是陈陈相因，较少特色。普及性选本低水平重复出版，是出版资源的浪费。

三、中国古代散文研究队伍初步形成

前三十年，只有少数人写一些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文章，搞一些选本，基本上是副业，

而不以古代散文研究为主攻方向。在五六十年代，人们曾说，某某是古代小说研究专家，某某是古代戏剧研究专家，某某是古代诗词研究专家，很少听说有谁是古代散文研究专家。

近三十年来情况大有改变。这支专家队伍虽然还不够大，但是可以说基本上形成梯队了。中国古代散文学会联系的会员约二三百人，其中已有一批人以古代散文为专业，当然也还兼作其他文体研究和其他学科研究。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学者是名副其实的古代散文研究专家。

老一辈学者当中，郭预衡先生从事散文史研究时间最长，成就最高，而且自成系统。有一百五十万字的散文通史，近五十万字的散文简史和近一百万字的散文史长编。还有他与刘盼遂先生合作的历代散文选注两册，他主编而由弟子们分头选注的《中国古代散文作品选》六册，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此外，韩兆琦先生的《史记》研究和中国传记文学研究，曾枣庄先生的“三苏”研究和宋代散文研究，都在该领域首屈一指。刘衍先生已有三部中国散文史，或独著，或主编，还有一部大型选本。熊礼汇、阮忠、张新科等几位的成果也相当丰富。

中青年学者的成果相当可观，不少论著富于创新意义，在散文理念和资料发掘上都狠下工夫，有些题目是一般人不曾注意的。中青年学者精力充沛，外语水平、资讯手段都优于老年学者，有后来者居上之势。

四、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展望

（一）努力实现古代散文研究与现代生活的科学对接

如何实现古典文学乃至传统文化的古为今用，是中国学术界一直在思考的重要问题。六十年来，有不少经验教训。最近两三年，于丹讲解《论语》、《庄子》，王立群、韩兆琦讲《史记》，把古代经典推向大众，结合现实需要，造成了轰动性效应，开辟了学术研究的新道路。他们讲这几本书，并非单纯从文学或哲学、史学角度，而是从人生境界、道德修养和历史启示进行阐发，由于密切结合人们的实际需要，因而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古代散文研究者应当认真反思，如何走出书斋，面向大课堂，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渴求。当然，这项工作，还不等于学术研究的全部，而是属于普及性质，此外还有偏重于提高性质和基础资料性质的工作，等等。但是，面对这股中华传统文化热潮，古典文学工作者要去迎接，而不能回避，更不应责难挑剔。应该把普及与提高结合起来，正确处理长远性课题和现实性题目的关系，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

要从古籍中总结出符合历史文本实际，同时有益现代的东西，不能离开文本，附加古人所没有的东西。不能改铸古人，古为我用。

结合实际，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通俗化。一定要对古代典籍有透辟的理解，把握其精神实质，而不是片面地抓表层皮毛。还要用生动具体、形式多样的表达方法，要通俗，不要庸俗，要适合大众口味，而不要迎合某些市场趣味。有些观念，今天很热门，古代未必有，就不必去牵强联系，例如投资、股市、期货、工商管理、市场培训等等。如果把古代作品某些只言片语，夸大引申为今天流行的市场经济理念，以为这就是与现实对接，这是讨好大众，对传统文化难免误解甚至肢解。我们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避免五十至七十年代片面提倡“学术为政治服务”、“为现实斗争服务”而造成的教训。

（二）重新建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古代散文价值体系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以诗文为中心的。20世纪以来，西方文艺理论传入中国。在“五四”以后的文学价值体系中，散文被边缘化了。就目前情况而论，对诗歌、小说、戏剧的评论，西方文学价值观基本上占主流，散文情况略有不同。完全采用西方文艺理论并不能解释中国古代散文诸多现象和问题，于是就难免出现观念贫乏和混乱。不少人感到，在古代散文教学与研究中，缺乏自己的话语，要么套用诗歌小说戏剧的话语，要么搬用文化名词、哲学名词。总之，现有理论不能满足客观需要。

我认为，重建中国民族特色的古代散文价值体系是必要和可能的。首先，这种体系应该是民族的，要努力继承两千多年来这方面的丰厚遗产，认真加以清理，使之系统化、理论化。例如评点，从宋代以来沿用了一千多年，“五四”以后被摒弃，现在看来，应该恢复其应有地位。即使不用眉批、夹批、尾批这些排印方式，其中许多基本观点、方法、技巧，还是可以采用的，例如文以气为主，文以载道，气盛言宜，文从字顺，起承转合，关锁照应，破题承题，跌宕纵控……其次，这种体系应该是现代的，可以和国际文学理论对话的，而不是食古不化、艰奥含糊、莫名其妙的。要把古代散文理论和概念加以现代的科学的说明、阐释，努力激活这些传统话语，赋予新的生命，也要吸取诗歌小说戏剧理论相关部分，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补充。再次，应该尽可能参考文化学、历史学、哲学、美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体系，既不生搬硬套，又不拒绝排斥。因为古代散文作品往往并不单纯是文学，同时也具有上述诸多因素。目前，整个中国文学研究都具有向文化研究升华的倾向，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皆然。大方向应该肯定，但是也不能不警惕玄学化、概念化、空洞化，不要重蹈过去三十年泛政治化的覆辙。

（三）积极创新、大胆探索，避免陈陈相因，尽量减少低水平重复的题目

近三十年，关于古代散文研究的文章著作数量相当庞大，但是真正具有学术性的开拓或深探之作不多，称得上精品的更少。重复最多的是译注类，或因出版社盲目追求配套而不惜选题重出，或因为作者未充分查阅有关资料，甚至不太了解学术情况，闭门造车所致。更多的人是为了赶浪潮，追风头而仓促成书。古典散文有大量课题待开发，不必大家一窝蜂都涌向少数热点。系统的断代散文史至今只有汉代和明清两部简史而已，不少流派、作家、作品尚无人关注。如果用新的思维理念，新的价值取向，新的角度与方法，研究题目应是层出不穷的。大可不必凑热闹，也不必停留在某些固定的价值观念和研究模式上。试看中国台湾地区、日本和美国的同行们，他们有关古代散文的文章和著作数量虽没有中国大陆那么多，但却不乏新意，活泼自由，富于个性，很少重复。即使一些属于传统的题目，如注释、考据、资料辨证之类，日本和中国台湾学者也做得很扎实，很有水平。他们沉得住气，不像大陆学者为评学位、升职称、提工资、申请课题费而赶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有人为了所谓“创新”而提出“颠覆文学史”的口号，这发端于台湾地区，波及大陆。把屈原、诸葛亮、李白、欧阳修等重要历史文化人物彻底否定，而又没有什么站得住的道理和证据。这是十分有害的，甚至可以说是对中华文化的糟蹋。

关于古代散文研究的国际交流问题。中国古代散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古代散文是外国人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教材。我们有许多的工作要做，有不少的经验需要总结。三十多年来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国际交流活动，在诗歌、小说、戏剧、古代文论方面，开展较为多些；而以中国古典散文研究为主题的海外国际会议，一次也没有举办过。我热切期望，首先争取在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能举办中国古代散文专题研讨会，然后扩大到韩国、日本、泰国。希望各个国家和地区有更多的中国散文研究者、爱好者，加入这个会场，逐步形成国际性的队伍和联络网，把中国古代散文这份丰富的文化遗产，传播到全世界。

作者简介：谭家健，男，1936年生，湖南衡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古代散文学会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散文研究。

“古典散文学”体系的建立及其意义

王长顺

(咸阳师范学院国际交流学院 陕西咸阳 712000)

摘要：中国古代散文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从宏观方面考察，还有许多不足；从微观方面看，还存在着需要进一步阐释或界定清楚的具体问题。因之，建立“古典散文学”体系是十分必要的。自古及今，古代散文所产生的丰富理论以及丰硕的研究成果使得“古典散文学”体系的建立成为可能。这一体系包括本体系统、主体系统和社会关联系统三大类，各类又有相互影响和联系的若干子系统。建立“古典散文学”体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为建立这个体系，广大学者应采取必要的措施，按照一定的步骤实施。

关键词：古典散文学；体系建构；文化意义

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散文是一种渊流深远、被人们广泛应用、欣赏和接受的文体。冰心先生曾说：“我们中国自古是个散文成绩最辉煌、散文作者最众多的国家。”散文是我国“丰富多采而又独树一帜的传统”。^①著名散文作家郁达夫也曾经说过：“中国古来的文章，一向就以散文为主要的文体。”^②的确，相对于诗歌、小说、戏剧来说，中国古代散文数量众多，源远流长。自古及今，对散文研究的文章和著作也相当丰富。然而，古典散文的研究也存在许多问题，因此，建立“古典散文学”体系，进一步从学科角度解决相关问题，不仅势在必行，而且也切实可行。

一、建立“古典散文学”体系的必要性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散文同诗歌的发展，可以说并驾齐驱，名作名家浩如烟海，极为丰富，历史上对散文的研究也是比较多的。近年来，古典散文研究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反映一定时代散文创作成绩的大规模断代散文总集开始有组织地或影印或编纂并

① 冰心：《我们的新春献礼》，《人民文学》1980年第1期。

②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序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陆续出版；质量高、规模大、影响广的通体性史论著作获得出版；断代和专题性的论著也时见出版，有的还产生较大的影响；散文史的研究由客观而精细，由普及而提高，许多问题或重要的散文文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分析梳理。^①但总起来看，古代文学中对诗歌、小说和戏剧的研究介绍要多于散文。就散文来说，目前的研究状况还不尽如人意。从宏观方面考察，古代散文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

一是研究方法和视角需要更新。“传统的文章理论显得零碎，很难适应现代学者对散文研究的需要；而现代流行的新理论在古典散文研究方面又苦于找不到恰当的结合点。因此，虽然有不少学者努力标榜创新，但是在散文研究方法上，总是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很难‘随心所欲不逾规（矩）’。”^②因此，我们应当试图寻找新的方法，用文化研究来阐释散文，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去观照散文，从社会学的视角去审视散文……凡此种种，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尝试，这就需要建立“古典散文学”，去开掘更适合于散文研究的新方法。

二是研究的思路和重点需要进一步明确。20世纪以来，中国古典散文研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还存在着“两多两少”的现象：散文史研究多，艺术性研究少；研究中概括描述多，规律探寻少。20世纪以来的百余年，古代散文通史、分体散文专史、断代散文史、史论著作等研究专著共有二百余部，古代散文选本则更多（多达二百三十多部），但与此不相适应的，就散文艺术性、审美性进行研究的专著却很少（不足十部）。^③“有见于此，在历届古典散文学术研讨会上，与会者一致认为，加强古典散文艺术性理论研究应是当务之急。”^④另外，目前对中国古代散文发展规律的研究还不够。有专家认为：“散文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关系问题，这当然不是所谓的‘自身规律’”，“却是起决定作用的规律”。^⑤有学者认为，对散文发展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现实政治。有学者却认为，并非重大的社会变革都一定引起散文的变化。^⑥散文与社会政治关系的规律问题，目前还没有定论。有些问题诸如散文发展变化与时代兴衰的关系、散文与民间文学的关系、散文与政教的关系、散文的“载道”问题等等，都需要我们更深层次地去探究。更为重要的是，散文自身在语言运用、思想内涵、表现手法、创作方法诸方面的变化轨迹和发展规律，更值得我们去思索。因此，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理清古代散文的研究思路，确定研

^① 参见王利锁、孙继海：《关于古典散文研究的思考》，《河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② 陈飞：《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③ 详见谭家健：《中国古代散文史稿》，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

^④ 谭家健：《中国古代散文史稿·近20年中国散文史著作及选本举要》，第609页。

^⑤ 郭预衡：《写于〈中国散文史〉上册问世之际》，《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

^⑥ 参见谭家健：《中国古代散文史稿》。

究重点。

三是研究水平还不够高。几十年来的散文研究，“大多数停留在讲义的水平上。比如先秦、两汉散文，这是中国散文史上最为辉煌，最值得夸耀的典范。……可是，在这样一个巨大的文化宝库面前，我们的文学研究显得那样苍白，那样乏味，总是徘徊在它的外围，找不到进入的途径。这样，就使得这种研究既缺少魅力，更看不到应有的勃勃生机。翻开现代有关的研究著作，大都是一副毫无生机的面孔。要么是一个一个作家的论列，颇似文学家小传；要么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组合，就是平庸的讲义”^①。即使用力较多的散文通史研究，多数还停留在作家作品论的排列，真正能独树一帜的不多。另外，研究中的重复现象严重，撰写名家散文史，在结构、体例、重要观点、方法上，难免同多于异；古代散文理论研究，多数也是按朝代和文论篇目论列，深层次分析不足。然而，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古代散文在审美意识方面具有自己的特点，“中国散文史的任务之一，就是阐发这种独特的审美意识”^②。总的看来，中国古代散文通论仍然比较薄弱，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尚有待深入探讨。例如中国古代散文的审美意义与艺术追求较诗歌小说有何不同？中国散文的民族特征是什么？古代散文与现代散文有何区别与联系？古代散文的发展规律、盛衰原因是什么？等等，目前学术界认识还不一致。因此，有必要建立“古典散文学”，对其进行进一步探究，以提高研究水平。

从微观方面看，散文研究中还存在着许多需要进一步阐释或界定清楚的问题：

一是关于散文的概念问题。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与诗词并列为文学正宗的另一重要文体，就是散文。关于“散文”的概念，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历史上，散文的概念，先秦时期开始出现“文”、“文学”，两汉时期开始有“文学”与“文章”的区分，魏晋以后，有“文”、“笔”之分，在唐代，提倡“古文”，到了宋代，才出现了“散文”这一名称^③，到了清代，“散文”的名称才开始流行。仔细考察“散文”名称的由来及其相关规定性，可以看出，我国古代“散文”这一概念是与韵文、骈文相对应的概念。《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中对“散文”的解释是：(1)“散文”相对于“韵文”讲，是广义的，泛指一切无韵的文学。(2)“散文”相对于“骈文”讲，也是广义的，指那些单行散句，不拘对偶、声律的语文体，即唐宋以后所称的“古文”。有学者在对中国古代散文进行界定的时候，认为应当将辞赋和骈文归于散文类。因为广义的散文观念保持了散文概念的严整性，这样也是对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散文观念的尊重和认同。有的学者则

^① 陈飞：《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第34页。

^② 同上书，第35页。

^③ 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引周益公“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词贵浑融有味，与散文同”一语。

从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上来对“散文”进行界定，认为既然散文同韵文相对，那么那些讲究韵律、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辞赋，就可以不予讨论。^①因此，散文的概念问题需要进一步确定。

二是关于散文的文学性问题。人们一贯把形象性、社会性、情感性作为衡量文学作品文学性的尺度。由此，一些学者认为，对于古代散文作品，那些记人记事写景记物，鲜明生动，富有生活气息，表现社会和人生的优秀记叙类散文，那些富有真情实感、思想感情高尚美好、抒情浓郁的优秀抒情类散文，那些巧妙地因事生议、托物喻意、形象地批判社会的讽谕类散文，都可以看作文学作品。那些论说文章，虽然“以立意为宗”，如果能做到形象化，“情动于中”，“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也能做到“以能文为本”的，也可算作文学作品。^②有的学者认为：“散文作品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秩序与和谐，就有美的蕴含，也就有文学性，不论它们是不是实用文章。”^③有的学者则认为，对于散文文学性的界定，应当与散文产生的时代有某种关联。在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还不够明确、文史哲尚未完全分家的汉代，散文的范畴应该划得稍宽一些。有一定的文学性或在散文发展史上发生过某种影响的作品，诸如章表奏疏、碑铭史传、书信杂记直至某些哲学著作，都可以列入散文的范畴加以讨论。由此，散文文学性的规定性还不明确。另外，散文实用性和文学性的相互关系及影响，应用性散文是否具有文学性，散文文学性的本质特征等问题，都需要我们更加深入地进行研究。

三是关于散文的分类。历来散文的分类标准大致有三：按文章是否属于文学作品，有“文”、“笔”之分；按是否通篇对仗，又分其为骈文和散文；按用途内容，又可以分为许多类。古人对文章的分类大多是根据文章的内容和用途来分的。最早划分文章体裁的说法当始于汉末的蔡邕。在他的《独断》中，“已分天子令群臣之文为四类，曰策书、诏书、制书、戒书。群臣上天子之文为四类，曰章、奏、表、驳议”。但后来曹丕的《典论·论文》才真正开了文体论的先河，他分文章为四类八科。自此以后，文体数目越分越多。梁代任昉《文章缘起》分为八十四类，刘勰《文心雕龙》把文体分为三十五类，萧统《文选》除诗赋外，分文体为三十六类，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分为五十四类，徐师曾《文体明辨》分为一百二十七类，姚鼐将文体分为十三类，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分文体为一百三十二类，可谓林林总总，纷繁复杂。

现代学者对散文的分类，也有内容和形式的区别，但又因现代文章观念的影响而与

^① 参见韩兆琦、吕伯涛：《汉代散文史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 详见周明：《中国古代散文艺术》，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③ 朱世英、方遒、刘国华：《中国散文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古代文体论截然不同。有人认为以文学性而言，可以分为文学散文、非文学性文章和具有一定文学性的散文三大类。按内容划分，又可归为十余类。有的学者又试图按照不同时期的文体特点来分类论述。将先秦、秦汉、六朝的散文以体裁分，如先秦散文分为语录体、传诵体、寓言体、论辩体，秦汉分为赋体、史传、论理、奏议书启之文，元代分为议论、记叙、笔记之文。^①能否以现代散文的分类标准（记叙性散文、说理性散文、抒情性散文、实用性散文）规范古典散文分类，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郭预衡先生把散文定义为“汉语的文章”。他认为，散文史的文体范围就不应当限于那些抒情写景的“文学散文”，而是要将政论、史论、传记、墓志以及各体论说杂文统统包罗在内，不仅如此，就连骈文和辞赋也应当包括在内。^②而又有学者持反对意见，认为赋乃是中国古代文学在其发展中所产生的独特文体，是一种介于诗文之间、非诗非文而又亦诗亦文的独立文学样式。赋在发展演变的不同阶段所形成的品类，往往有着和其他文体相接近的倾向和不易区分的模糊性，故应将赋作为专题进行专门研究。^③

另外，从总体上来看，目前的古典散文研究还有一些空白和盲点：

一是古代散文与物质文明、精神文化的关系研究。“文”、“文章”、“文学”等都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的精神文化产品，它的诞生与物质文明有着必然的联系。同时，精神文明的其他方面如思想道德、政治、哲学、文化等，对散文的发生、发展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这一点毋庸置疑。反过来讲，古典散文对于政治、文化的生态功能也绝不能漠视。但是古典散文研究者还很少有人著文去系统研究古代散文与哲学、历史、政治、经济的关系，这应当引起人们的注意。

二是建立古典散文理论体系。理论体系的建立，对于一个研究领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建立古典散文理论体系，就能以之为纲，统领古典散文理论研究。然而目前的状况是，“治中国古代散文理论者固守传统的散文观念，对现代乃至西方闭目塞听”，因此，在“散文理论研究的‘分崩离析’状况”下，“建立包括古今中外散文理论的整体框架，确立人类健全的价值理念，以多元整合的方式检视不同的散文理论‘为我所用’，探讨散文的内在秘密，以建构既具有包容性又别具特色的散文理论体系，这是避免狭隘、片面和盲目的明智之举”^④。

三是古代散文对于当代散文创作发展的影响和意义研究。古代散文的研究，同古代

^① 详见张梦新：《中国散文发展史》，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② 见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③ 见刘振东、高洪奎、杜豫：《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④ 王兆胜：《当代中国散文理论建设中的盲点》，《学术研究》2004年第11期。